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云南

团结合作 共赴国难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 与云南地方实力派

袁 丁 李继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1935年，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制造了华北事变。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从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恢复重建后，认真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各阶层、各界爱国力量精诚合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争取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团结合作，共御外侮，促进了云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巩固，为云南全民族团结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云南是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多年由龙云为首的地方统治集团掌握政权。由于各种原因，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有统治阶级的一致性，又有各种利益冲突的尖锐矛盾，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洞察到地方实力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特殊地位，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在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伟大的长征途中，为了争取北上抗日的红军能较顺利地穿越云南，中共中央和红军通过多种渠

道对龙云和一些滇军将领开展工作。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陈赓雅以“云南旅沪同乡会”和“云南旅沪同学会”的名义，写信给龙云，阐明外敌入侵、民族危机的形势和红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希望他以保存实力为重，不要与红军过分为难。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刚刚恢复重建的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及时翻印了这个文件，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主张。1936年春，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贵州毕节，肖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人联名写信给龙云、滇军将领孙渡，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周素园及参谋长邓止戈（中共贵州地下党负责人）也以私人名义分别写信给龙云和孙渡、安恩溥、鲁道元等，揭露蒋介石派嫡系部队入滇黔地区追剿红军是“假道灭虢，史有明鉴”，希望他们发扬护国首义的光荣传统，参加抗日，和红军一致行动；红军到达宣威后，贺龙又指示李达给龙云写信，劝他不要阻击过境红军。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影响，云南地方实力派权衡利弊，采取保存实力的策略，对过境红军未作过多的重大阻击，红军较顺利地通过云南，继续北上抗日的征程。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共中央、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云南地下党对云南地方实力派及云南各界人士开展了大量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工作，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云南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出兵抗日问题。龙云离滇赴会，在西安与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相遇并同机到达南京。途中及会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与龙云数次晤谈，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支持和鼓励龙云积极出兵的抗战热情，交流对坚持抗战的主张，中共领导人赠予龙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鼓励其为抗日

作出贡献。龙云表示赞同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出兵二十万，“愿为国家民族神圣抗战到底”，并提出派人到延安学习游击战术，培养军事干部的要求，得到中共的支持。龙云回昆明后，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发动和组织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通过宣传和发动群众举行集会、游行和请愿活动，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进一步支持和鼓励龙云出兵抗日。在中共的工作和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救亡热潮鼓舞下，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对所属滇军精锐部队进行整编，组成六十军和五十八军，加上补充团队及其他附属部队约 22 万人，先后开赴抗日前线。滇军将士出征时，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发动各界群众热烈欢送，鼓舞斗志；还先后派遣部分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随师出征，帮助建设部队，团结滇军将领，坚定其抗日信心。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鼓舞下，滇军将士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杀敌，在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中立下了战功。在抗日救亡热潮高涨的形势下，云南地方政府在各阶层人士的积极支持下，组织各族人民抢修了抗战的重要交通运输线——滇缅公路。在中国沿海口岸被日军侵占后，这条公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支持抗战的“大动脉”，国外支援抗战的大量物资，通过这条公路运往前线。1938 年 8 月，八路军总指挥朱德致函龙云，盛赞云南对抗战的贡献：“抗战军兴，滇省输送 20 万军队于前线，输送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指出：“在将来抗战中，在争取最后胜利的搏斗中，云南将肩负更大责任，成为抗战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希望龙云“发动民众，巩固其爱国热忱，发挥其救亡伟力，同心协力，缔创独立幸福之新中国，以符合历史上著名革命发祥地——云南之光荣传统。”这封信在《云南日报》刊载后，在云南各阶层中引起很大反响，更加鼓舞了云南人民的抗日热情。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

于“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要求，中共中央通过王若飞的舅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齐生，向龙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宗旨，商谈释放政治犯问题。1938年，龙云电邀随红军长征到延安的周素园（时受聘任八路军高级参议）到昆明，委任他为云南省政府咨议，受中共中央委托，周素园对龙云开展了很多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营救被龙云关押的共产党员出狱，并配合收容部份流散云南的红军将其送回延安。抗战初期，在《云南日报》社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编发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大量文章，云南地方当局采取了默许态度。通过中共的工作和影响，1938年7月，龙云在奉蒋介石命赴武汉谒蒋期间，明确表示：“对倭抗战，今日已到重要阶段，我们要从血的教训、铁的信念中，把握着最后胜利，要忍受绝大的艰苦，绝大的牺牲，支持抗战到底。全国军民，只要一心一德，相信最后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无疑。”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了广州和武汉，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加强了妥协、投降和反共活动，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对妥协、投降、反共的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战大后方云南的团结抗战局面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1938年底，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途经昆明到河内，公开叛国投敌。汪精卫集团的这一行径，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内坚持民族自卫抗战的爱国人士及爱国将领的一致强烈谴责和批判，在全国掀起了声讨汪精卫集团投敌的运动。针对社会上流传妥协主和论调的倾向，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坚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关于“讨汪”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发动云南社会各界各阶层人民，掀起了以青年学生为骨干的“讨汪”运

动，同时，也对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进一步开展争取工作。1939年1月，《云南日报》的中共地下党员唐登岷连续写了短评和社论，揭露和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罪行。中共云南省工委安排刘惠之做龙云顾问刘震寰的工作，推动他在报上发表文章，声讨汪精卫，反对分裂、投降；并指示李群杰找袁丕佑，刘惠之找辛亥元老李根源，欧根找杨竹庵等交谈时声讨汪逆，通过他们影响龙云。在全省军民的声讨汪精卫卖国罪行、拥护抗战到底的强烈呼声中，云南地方实力派坚定了抗战信念，龙云于2月公开与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拥护国策，抗战到底，并把汪精卫写给他的诱降信在昆明各报公开发表。10月，龙云正式通电声讨汪精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云南得到巩固和发展。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限共”、“反共”的具体办法，掀起了反共逆流。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计出发，坚持国共合作的方针，继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制投降、分裂逆流。在云南，中共云南省工委明确分工李群杰负责统战工作，并布置凡有条件的党员都要做上层统战工作，不断向龙云及其决策集团成员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通过多种途径影响龙云。1940年日军南进后，9月26日、27日，朱德、吴玉章分别以师生和故交关系给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人士李根源写信，盛赞他的爱国热忱，向他陈述中共对抗战形势的看法和主张，吁请他发挥影响，策动抗御南进日军。在此前后，云南党组织通过李根源、张冲、刘震寰等向龙云提出保卫云南，必须改进政治，在政治上民主，军事上加强，容纳青年为抗战出力等办法，龙云表示同意。11月，《新华日报》专门派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和李根源，向他们介绍抗战面临的分裂、投降危险，以及中共坚持的正确方针。通过交谈，龙云表示：“敌人图谋加紧挑拨离间，全国应加紧团结，抗战到底。”李根源也表示了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新华日报》发表了这两篇谈话，对在西南

后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很大影响。

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一再对龙云施加压力，逼其反共。1940年4月，何应钦专程到云南，敦促龙云在昆明建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加强对共产党活动的防范和镇压。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一些倾向民主进步又接近龙云的统战人士，向龙云陈述利害，若成立这个机构，有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战及地方都无利。通过说服争取，龙云迟迟不按何应钦的要求设置机构。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分裂危机空前严重。2月，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带着搜捕共产党员、破坏中共党组织和筹办集中营的计划窜到昆明。康泽在昆明，歪曲皖南事变真相，制造反共舆论，同时加紧训练特务，布置破坏云南地下党组织。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云南地下组织遵照中共南方局的紧急部署，做好防范突然事变的准备，同时，秘密翻印了朱德、彭德怀致何应钦、白崇禧电，中共中央军委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周恩来为江南死难烈士致哀的题词等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分裂活动的文件，广泛分发给龙云及其僚属、各界爱国人士，揭露皖南事件真相和反共顽固派挑动内战的阴谋，呼吁维护团结、共同抗日，并积极组织力量，委托和推动统战人士与龙云及其周围的人士交谈，陈明利害，提出康泽的反共计划得以实现，只能对日本侵略者及排斥异己的阴谋家有利；指出对云南地方当局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共方面，如果掀起反共浪潮，只能把云南安定局面搞乱。同时中共还对云南上层知名人士李根源、张冲、刘震寰、杨竹庵等做了大量工作，由他们出面反对康泽到云南进行的反共活动，在中共的工作和影响下，李根源和张冲致电蒋介石，公开反对康泽的反共活动，西南联大校方也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维护和尊重西南联大民主自由的校风”，拒绝康泽集中训练学生的计划。最后，龙云以“拿不出证据”为由拒绝实行大逮捕，使反共顽固派在云南的反共计划落空。同年7月，何应钦再次到昆，催

促龙云成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通过有关民主人士，再次建议龙云慎重考虑。龙云在无法继续推诿和拖延的情况下，组成了由他亲自挂帅、指定地方人士组成的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在“皖南事变”前后的险恶形势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也由于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对维护团结抗战重要性的比较清醒的认识，云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云南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没有遭受破坏。同时，龙云以昆明行营主任的权力，规定中央军不得进驻昆明市区，中央宪兵和警察部队，不得在市区执行任务，龙云政府还颁布了“不得借故限制和危害民众活动，有关当局必须协助并领导各社会团体共同保乡，以济时艰”的命令，多次通令省警备司令部，严禁任意非法捕人，并对大学教授和穷困的知名人士给予生活补贴等。龙云采取的措施，限制了国民党中央特务的反动活动，稳定了云南政局，使云南团结抗战的局面得到巩固。

抗战后期，通过中共多渠道、多方面以诚相待的团结、争取工作，云南地方实力派日益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和信任，从而主动寻求与中共建立联系，对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同情、默许、保护的态度。

1943年8月，龙云同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罗隆基晤谈时，提出要罗隆基设法寻找关系，邀请周恩来到昆明会晤。中共云南省工委了解到龙云这一要求后，派欧根到重庆向董必武作了汇报。10月，南方局正式指定华岗为中共代表，秘密与龙云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龙云的滇黔绥靖公署设立电台，建立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通讯情报联系。这些联系和工作，进一步促进龙云赞同中共抗战、民主、团结的主张，龙云集团对中共地下组织在云南发动的民主运动采取了同情和支持的态度。1944年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发动举办了“五·四”纪念周活动时，在昆明的何应钦，企图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龙云采取了敷衍、抵制的态度，纪念五四运

动的活动得到了保护。10月10日，中共云南党组织发动和组织昆明各界6000多人纪念“双十节”，大会公开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号召“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龙云派警察到会场维持秩序。12月25日，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发动6000多人纪念讨袁护国30周年，号召发扬再造共和的革命传统，争取民主，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表示支持纪念大会的召开。1945年3月，《新华日报》社派彭少彭到昆明，经龙云同意，建立昆明营业分销处，使《新华日报》在云南得到更加广泛传播。云南地方实力派实施的一些开明进步政策，维护了云南团结抗战的局面，促进了民主进步的发展。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一起建立、发展和巩固了云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云南全民族团结抗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

——抗日战争中的中共云南地方组织 与民盟云南支部

袁 丁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积极帮助中国民主同盟建立和发展组织，并与其之密切合作，坚持抗战和争取民主，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民盟成立了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一批中共党员参加了该组织，在盟内联系和团结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使之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1935年，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恢复重建后，发动和领导了有各阶层、各界人士广泛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疏散来昆，改名“西南联合大学”，上海、武汉等地的学校也先后疏散

来云南。大批知名学者、专家教授、爱国民主人士荟集昆明，加强了昆明的民主力量。中共云南地方党组织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在民主运动中，同广大知识分子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积极支持他们的进步活动，组织和吸收他们参加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促进了民主运动的开展。

1941年3月，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份社会贤达组织起来的，以大部分具有一定社会声望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参加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和帮助下，在重庆成立。它以“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完整”、“反对中途妥协”、“加强国内团结”、“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等为纲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加强了中国民主阵营的力量。

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以后，有计划地准备在西南、西北、华南、华北发展地方组织。因为昆明集中了大量民主人士，又有较好的基础，决定首先在昆明建立组织。在新的形势下，为了组织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进一步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和配合民主政团同盟在昆明开展建立地方组织的工作。1942年夏，中华职教社云南办事处主任孙启孟来昆。临行前，周恩来与他谈话，要他到云南要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开展团结、抗战的宣传工作。孙启孟到昆明后，联络各方爱国人士，李公朴、张天放、郑一斋、杨春洲、寸树声、艾志诚、刘达夫、周禾书、楚图南、冯素陶等人组织了“九老会”，通过每两周一次的茶会或聚餐集会，交换对时事政治的意见和看法，宣传团结、进步、抗战的方针。这一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为民盟昆明支部的建立，打下了一定的组织基础。

1942年底，民主政团同盟派中央委员、宣传部长罗隆基到昆明筹建云南地方组织。同时，南方局先后指派以盟员身份出面的

中共地下党员周新民等来昆帮助建立和发展民主政团同盟组织。来昆前，董必武亲自对周新民作了指示，要他广交朋友，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周新民到昆后，即与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取得了联系，使这一工作得到了云南省工委的配合和帮助。1943年初，南方局派华岗到昆明，由楚图南商请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胡小石，聘请华岗（化名林少侯），担任云南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以此为掩护开展统战工作。华岗提出倡议，与周新民商量后，组织各方面有代表的学者、专家和文化教育界人士，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其主要成员有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吴晗、冯素陶、闻家驊、曾昭抡及中共党员周新民、楚图南、尚钺、辛志超、李文宜等，该组织除了举办学术报告外，更主要的是讨论形势问题，通过党的宣传和工作，引导各种不同门户学派、流派的知识分子，摒弃歧见，在抗日、民主、进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罗隆基、周新民在昆明发展了第一批盟员。为了推动盟内的工作，中共党员楚图南、尚钺、赵澜、张光年、方仲伯、冯素陶等也先后入盟。1943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一个地方组织——昆明支部正式成立，周新民担任支部组织委员。同时，盟内组成由周新民任书记、李文宜、尚钺等参加的中共党组，领导盟内党的工作。

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建立后，周新民在组织上贯彻执行了南方局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首先打破了“三党三派”的限制，吸收了一些教育界人士和自由职业者入盟，使民主力量在民盟昆明支部中占据了主要地位。1944年9月19日，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间对组织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昆明支部周新民等出席会议的代表，提议取消“政团”二字，打破政团的束缚，广泛吸收各界人士以个人身份入盟。经过激烈斗争，会议决定，接受昆明支部建议，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这一决定是民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改变了政

团联盟的性质，把三党三派的联盟改为不是以“政团”为单位的联合体，而是政治主张相同的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扩大了民盟的社会基础，大批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加入民盟，削弱了原青年党对盟务的把持，极大地推动了盟组织的发展和巩固。此次会议上，昆明支部的周新民和罗隆基、曾昭抡、潘光旦、吴晗、潘大逵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

为了贯彻民盟全国代表会议精神，1944年10月1日昆明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决定改民盟昆明支部为民盟云南省支部。会上由周新民主持拟定和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执行委员会组织简章》，并选举了省支部成员，中共党员周新民、楚图南选为支委，周新民仍分管组织。由于民盟在组织工作上彻底突破了政团的束缚，广泛吸收了各方面的人士，如昆明无线电厂一批高中级科技人员，云大附中“虹社”读书会大部分成员，以及一部分公务人员和店员都加入了民盟，使民盟组织得到了很大发展。至1945年12月，全省民盟成员发展至200余人。

二

民盟云南省支部建立以后，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的爱国民主运动，有的由中共党组织策动和配合，民盟出面组织；有的是民盟中的民主人士发起，中共党组织积极配合，加强领导，推动了民主运动的高涨，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战后期，国民党的统治日益腐朽和反动，政治、经济和军事发生了全面危机，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统治日益不满，要求结束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宪政。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十一中全会，被迫作出“准备实行宪政”和在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并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推行假宪政。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允许在抗

战胜利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和实施宪政，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抗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宪政，就可能冲破国民党的宪制，把民主运动推进一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参加这一运动，并吸收一切民主分子于自己的周围，以达到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为响应这一号召，4月，周新民以民盟昆明支部名义发起成立了“宪政研究会”，周新民对老国民党员褚辅成开展了工作，取得他的支持，借出绥靖路贸易促进会作为活动场所。研究会由周新民主持，参加的有褚辅成、张奚若、夏康农、徐炳昶、郑昕、张剑、张静华等各方知名人士 40 多人，通过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呼吁民主，扩大宪政运动声势。该会发表了《我们在宪政前的要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进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1944 年 4 月，为了组织广大妇女参加民主运动，由民盟内中共党员李文宜主持，在盟内设立妇女委员会，广泛吸收了一批大革命时期的女党员、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开展妇运和民主运动。首先组织了几十个人的读书会，发展到 40 多人的职业妇女会，又发展到 100 多人的乐群团，最后到 300 多人的云南妇女联谊会，通过组织学习革命书籍，进行形势和党的主张的宣传和教育，组织和动员广大妇女，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了极好的作用。为了联系和组织昆明的学生运动，6月，周新民与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罗隆基商定，由民盟出面邀集联大、云大、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每两周在唐家花园集会一次，加强联系，研究开展学生运动的有关问题，从而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领导。7月7日，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联大、云大的几个进步壁报社举行抗战七周年纪念活动，在时事座谈会上，民盟积极组织楚图南和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发言，呼吁发扬“五四”和“一二·九”精神，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独立、自由而斗争。9月，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重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了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中

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在“双十节”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经省工委与周新民联系，会议由民盟出面组织。10月10日，在民盟云南省支部主持下，昆明6000余人举行纪念“双十节”大会，李公朴、闻一多、吴晗、张奚若、罗隆基等呼吁全国一致要求国民党必须立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要求切实保障人民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立即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立即彻底改善财政及经济政策；停止通货膨胀，减轻平民的痛苦；必须彻底改善士兵待遇，调整军队编制，并且普遍平均分配全国军队的装备与供应等，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2月25日，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学生自治会发起，召开“护国起义”三十周年纪念大会。经商定，仍由民盟出面组织，民盟省支部委员潘光旦担任主席，各界人士6000多人参加，许多民盟成员发表演说。会议通过了《纪念大会宣言》，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民主周刊》同时发表短评，宣传会议主张，扩大政治影响。1945年，为了响应党的“七大”号召，纪念“五四”运动廿六周年，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周新民等以民盟云南省支部名义与几所大学学生自治会商定，从4月30日至5月6日，举办“五四”运动纪念周，国民党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来昆布置镇压。省工委一面通过学生党员与各大学学校学生自治会商量对策，又由民盟出面与龙云洽谈，希望获得支持，不让何应钦插手此事。在龙云的支持下，会议顺利进行，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在“昆明各界青年纪念‘五四’反内战民主大游行”的前导下，由闻一多等领头，浩浩荡荡地走过昆明街头。这次活动把昆明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三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地方组织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与之密切合作，并通过其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就积极争取以龙云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中来，云南出现了团结抗战的局面。“皖南事变”以后，党中央、南方局及其云南地方党组织继续深入地开展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并通过民盟的关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42年孙启孟到昆后，根据董必武的指示，通过黄炎培的介绍约见龙云，对他开展了工作，并与他周围的龚自知、缪云台等都有接触。1943年5月，民盟昆明支部成立后，龙云通过该支部提出与中共建立正式联系的要求，经过中共云南省工委和盟内党员的积极联系，南方局派华岗与龙云建立了正式联系。民盟还先后吸收了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缪云台、龙绳武、朱健飞、金龙章等为秘密盟员，由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罗隆基直接与龙云联系。从而形成了中共、民盟和云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统一战线关系，从而保证和促进了抗战后期昆明爱国民主运动的迅速高涨。

民盟昆明支部成立前后，还对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开展了工作。如楚图南等遵照党的指示，对张冲做工作，张冲亦曾多方面支持民盟的工作。冯素陶也对原“新滇社”成员、绥靖公署少将作战处长刘达夫做工作，并发展了他为秘密盟员，华岗、周新民等对唐继尧的长子、青年党负责人唐筱冥、龙云的长子龙绳武、耀龙电灯公司经理金龙章、云南纺织厂厂长朱健飞等人开展工作，发展他们入盟，使他们支持民盟的工作，保持了团结抗日的政治态度。